

福利经济学：缘起、发展与解构

马旭东¹ 史岩²

(1. 内蒙古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2. 中国金融出版社, 北京 100071)

摘要: 福利经济学经历了公平、效率到自由的发展历程, 本质上是社会福利函数构建问题。构建社会福利函数是否遇到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这与能否构造衡量公平、效率和自由的基数效用有关。随着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的崛起, 福利经济学体系趋于系统化。福利经济学的内容和方法能够为国民经济运行提供指导, 同时不断修补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福利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72X(2018)02-0009-08

DOI:10.16011/j.cnki.jjw.2018.02.002

一、福利经济学的缘起: 问题与方法

经济问题贯穿于人类的整个演化史, 但经济学研究始于亚当·斯密。西蒙认为, 斯密之所以被称为经济学之父, 原因有三: “价值中立”的平民经济学、信仰上帝的个人主义视角和处理资源配置的市场。哈耶克认为斯密的经济学贡献是“经验理性、个人主义方法论和工具性市场”。以效率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是斯密完成古典经济学体系的主要任务。但舍默发现, 我们并非越富有越幸福, “财富与幸福脱节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遗传学和相对价值造成的”^[1]。

(一) 福利经济学的早期发展

1. 福利经济学的“史前时期”

斯密所处时代的人均 GDP 与文艺复兴前后相差无几, 这一时期“人均收入的提高方面不会有任何陡然变化”^[2], 低生产力一直困扰人类社会。“斯密通过一系列绝妙手笔, 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分析体系”^[3]——引起“国民财富”增长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 斯密通过个人主义、经验理性理解交易和市场, 给出“利己心—市场合作—国民财富”的效率研究进路。

沿袭斯密范式,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马尔萨

斯的边际报酬论、萨伊基于市场的要素论、穆勒的相互需求决定论, 都是顺应社会需求而提出。古典经济学一直沿用了效率范式“兼容”公平和自由, 直至马歇尔发表了《经济学原理》, 主流经济学开始倾向效率研究, 只有公平影响效率时才被经济学所关注。

2. 福利经济学的创立时期

福利经济学虽是主流经济学的分支, 但与主流经济学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自穆勒将功利主义引入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论发生了改变。帕累托创立了以效率为判断标准的新福利经济学, 与主流经济学相契合。与之相对照, 庇古提出以公平为核心的旧福利经济学, 与主流经济学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偏好和效用是福利经济学创立期的基础, 但不是当代福利经济学的基础。

(1) 新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帕累托认为社会效率的判断不应当建立在非均衡基础上, 因此提出了类比物理的、对一般均衡效率的判断标准——帕累托。这与主流经济学的阿罗—德布鲁范式相吻合, “帕累托或许是最早在社会科学中提出乘方律的人, 而且是在物理学尚未发现之前就开始使用了”^[4]。

(2) 旧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庇古继承了马

收稿日期: 2017-1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库兹涅茨曲线改进、公平多维拓展与收入分配差距容忍度研究”(16BJL040); 内蒙古自治区人才开发基金项目“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容忍度研究: 基于增长视角的测度与区域应用的预测”

作者简介: 马旭东, 经济学博士, 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学、收入分配与福利问题、产权经济问题; 史岩, 经济学博士, 中国金融出版社, 研究方向: 西方经济学。

歇尔的“衣钵”,但遵循的并非是剑桥传统,以公平为核心的福利体系在当时并不能较好的容纳效率。庇古从理论上显然承认马歇尔的基数效用,因为公平必须进行效用的人际比较。依据庇古命题,国民收入增加如果以收入分配扩大而获得,社会福利可能毫无意义。公平是福利的第一要务,丧失公平的经济增长可能成为无意义增长。

(二) 人类追求幸福的天性和经济学逻辑构建是福利经济学兴起的原因

1. 斯密虽未构建福利经济学体系,但早已形成福利经济思想

斯密的宗教信仰决定了其不可能遗弃社会正义分析,《国富论》的最后部分论述了社会正义问题。《国富论》的前三篇主要论述效率的性质与原因,后一篇论证公平的标准,全书都以自由为核心,认为市场是实现“效率、公平和自由”的工具。斯密以伦理学为基础,采用归纳和演绎法,验证了经济史数据与经济理论互证关系,提出市场是满足人类精神诉求的有效工具。

科斯认为斯密在解决陌生人之间的资源配置问题上使用了利己心和市场,在解决熟人之间资源配置问题采用了同情心和道德。效率范式方面,斯密的主要贡献是构建效率福利传统,为主流经济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公平范式方面,斯密的研究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

2. 新旧福利经济学在不同条件下产生,表达了不同精神诉求

新旧福利经济学代表了不同历史和经济条件下的精神诉求,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价值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边际革命以后,价值理论的改变引起了福利经济学走向效率传统。效用是基数的还是序数的,关系到人际可比性和社会福利可计算性。庇古的公平观只能建立在基数效用的基础上,否则人际不可比将使公平失去基础,帕累托的效率可以放弃基数效用论,无需考虑公平的福利标准,只要能够排序即可。围绕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展开了持久的争论,正是人类对公平和效率诉求的表达。

3. 研究评价指标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指导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

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争论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学概念。被马歇尔引入经济学的消费者剩余(CS),正是为了度量基数效用而产生的概念。希克斯的度量标准和黄有光的“钻石物品问题”都是对CS是否能够度量基数效用引起的再思考。

公平和效率关系人类福利,度量公平和效率的效用是福利分析的基础。基数效用实质上包含序数效用,只要能够给出具体的数,自然能够对大小进行排序。因此,寻找基数效用是福利判断的核心,关系到个体福利加总成社会福利问题和社会福利的排序问题,即研究社会福利的基础。

二、福利经济学趋于系统化的发展

研究福利经济学,效用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偏好是异质的,但满足偏好所带来的效用是同质的。因此,研究福利先要弄清效用,围绕效用展开的社会福利函数构建成为福利经济学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 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1. 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基础: 效率与公平整合

自帕累托最优被公理化以后,“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不兼容”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棘手问题。

(1) 卡尔多和希克斯以效率为基础,从个人福利走向社会福利。卡尔多在《经济学的福利命题和人际间效用比较》中提出了效率的社会福利改进标准,认为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得到改善,而其他福利不比以前差,那么这一变化即是好的,希克斯提出了与卡尔多类似的逆标准。帕累托最优是在效用“人际不可比”的条件下成立的,而卡尔度和希克斯的社会效率改进标准,具有“人际可比”的特点。

(2) 西托夫斯基准则。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从个人福利推导社会福利,发现了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很容易陷入循环。为了避免这一点,西托夫斯基提出了“顺检验+逆检验”的联合检验标准,认为同时满足卡尔多准则(顺检验)和希克斯准则(逆检验)在避免循环的同时能够验证是否是真正的改进。西托夫斯基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个人福利到社会福利的问题,联合检验仅能避免两种配置下的循环,在情况复杂些时西托夫斯基准则也将失效。

(3) 公平和效率的第一次融合: 李特尔准则。李特尔指出,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能够在公平不变情况下成立;而在效率不变条件下,公平改善同样是社会福利的改进。李特尔准则第一次将公平和效率放在同等地位上考察社会福利问题。

2. 公平和效率的系统整合以及引发的逻辑问题的思考

(1) 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的构建。柏格森强调:福利函数的数值,取决于所有影响福利的变量,包括每一家庭所消费的每一种货物数量和所从事的每一种劳动数量,以及每一种资本投入的

数量等。柏格森将消费、交换、分配和生产等因素纳入一般化函数中,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函数。萨缪尔森利用柏格森社会福利函数建立起社会福利函数与个人效用函数之间的关系:

$$W = W(W_1, \dots, W_n)$$

$$\text{其中 } \frac{\partial W}{\partial W_i} \geq 0, \frac{\partial^2 W}{\partial W_i^2} \leq 0.$$

B-S 社会福利函数具有与希克斯的无差异曲线类似的特点: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个人效用的增加能够增加社会福利水平;社会福利不变的条件下,个人福利间的替代能力递减。B-S 社会福利函数继承了李特尔准则的“效率和公平的同等表达”和卡尔多-希克斯的社会福利概念:社会福利等高线外移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等高线凸向原点意味着在同等效率的条件下,社会倾向公平。因此,B-S 社会福利函数能够解决效率和公平的综合社会排序问题。

(2) 个人效用合成社会福利的困境:阿罗不可能性可能。1951年阿罗在发展孔多塞悖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社会科学发展的阿罗不可能性可能(AIT)。阿罗认为,通过个人偏好难以合成社会福利。AIT在逻辑上容易得到证明:只要自由三择被满足,并且满足帕累托准则和无关独立性假定,那么最终社会必将陷入孔多塞悖论,只有独裁(某一人的偏好影响社会选择)才能打破这一局面。AIT为社会福利分析带来了令人沮丧的结论:自由民主条件下无法通过个人偏好合成社会福利函数。

(二) 公平与效率融入统一框架是福利经济学趋于系统化的表现

1. B-S 社会福利函数形成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分析框架

B-S 社会福利函数与主流经济学具有相同哲学基础。通过社会福利最大点(社会福利等高线和总效用线的切点)的逆推能够找到资源配置、产品分配和市场均衡状态,这无疑给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但这一时期的社会福利函数构建存在“社会关系淡化”和“人性丑化”的嫌疑。

2. 从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走向一般化社会福利函数

(1) 人性问题。黄有光认为 $W = W(U_1, \dots, U_n)$ 与 $W = W(W_1, \dots, W_n)$ 两个社会福利函数不同。前者是以“自我关注”^[5]的人构建的社会福利函数,后者是以“自我关心”^[5]的人构建的社会福利函数。

主流经济学以自我关注的理性人构建的社会福利函数只能兼容前者,前者构建的社会福利函数具有极度自私和淡化人际关系的嫌疑,不是真实人和真实社会关系的反映。

(2) 社会偏好问题。B-S 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依赖于社会偏好。罗尔斯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具有“L”型特征,即“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6]。精英主义者反对罗尔斯主义的观点,认为罗尔斯的公平观其总效用线斜率大于1,必然存在福利改进的余地,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使先天条件最好的那部分人受益,那么社会福利才能实现最大。纳什主义和效用主义从独立和相关两个极端,验证了公平和效率的最优组合点。上述观念虽具不同的伦理,但都是B-S 社会福利函数的特例。B-S 社会福利函数是福利函数的一般性表达,可以囊括上述所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为个体福利合成为社会福利的带来希望。在回避基数效用的同时又能够合成社会福利函数,但这一思想很快被阿罗所否定。

3. 社会福利函数是否遇到了 AIT

社会福利函数是否存在,或者AIT在现实中是否成立,关系到社会福利能否进行理论构建。AIT成立的前提是:序数效用下的弱帕累托准则、完全理性、信息完全和人际的不相关。围绕AIT的前提,经济学界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三) 社会福利函数对国民经济运行具有指导作用

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以及对社会偏好的认知,对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具有指导作用:第一,构建符合社会偏好的社会福利函数,能够对社会状态排序,从而指导国民经济的福利方向;第二,社会福利函数不同于效用函数,超越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将人性、社会偏好等因素纳入,是真实世界的国民经济学;第三,综合公平和效率,能够对国民经济进行多维考察;第四,社会福利函数构建需要识别稀缺变量,通过稀缺变量的识别和调整对国民经济福利改进具有指导作用。

三、福利经济学趋于复杂性的新发展

二战后,世界两大阵营在公平和效率上各有侧重,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高公平和低增长与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低公平和高增长形成了鲜明对照。社会福利函数对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来源的解读缺失,使得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向公平和效率的实现途径:自由。

(一) 新兴福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福利思想的崛起

1. 社会福利的反对者哈耶克与奥地利学派的福利观

哈耶克认为,功利主义哲学将福利经济学引入歧途。“无法明晰地向他人交流知识,对标准的福利经济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7]哈耶克既反对旧福利主义也反对新福利主义,认为二者都存在严重弊端甚至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原因有二:第一,知识是分散于不同经济主体的,无法将个人的私人知识加以利用;其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社会排序信息是无法获取的,加总为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可能的。哈耶克认为“贸易肯定是作为一种个人关系发展起来的”^[8]。离开个人主义的市场,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都无从谈起。

哈耶克认为旧福利经济学存在核心错误:首先,庇古关心的并非是物质分配而是效用分配,忽视了物质分配带来的直接影响;其次,效用可以在人际间进行比较,忽视了效用的主观性和不可比性。哈耶克认为新福利经济学存在核心错误:第一,关心个体成员,但提出“超个人”的福利概念。新福利经济学提出社会福利的概念是危险的,社会福利意味着可以将个人福利合成为社会福利,此种行为非常容易被利用。第二,社会不是行为主体,仅仅是一个隐喻。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有机体,而不是具有行为能力的“行为人”。

哈耶克的唯一福利标准:协调。社会中的所有人在“分散的知识、最优的无知和真正的错误”之间进行选择,而能够避免在分散的知识和最优的无知条件下少犯错误,只能通过市场进行有效协调。哈耶克提出了“社会福利”的两个标准:“事态的协调状态标准”和“检查并纠正存在失调的协调标准”^[9]。协调既可以指事实上已经彼此契合的、正在实施的契约活动,也可以指原先互相抵触而不协调的活动得以纠正并趋向于互契。哈耶克的标准实质上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标准,福利只有在个人主义下的自由市场中才能得以实现。

2. 重拾密传统的阿马蒂亚·森以及新兴福利经济学流派

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与伦理学并不存在冲突且存在契合性:利用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能够为道德哲学做出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为主流经济学做出贡献。福利研究不能“滥用”理性人,否则,伦理学与经济学将不相容,福利经济学

在主流经济学中也无从立足。“现代经济学无伦理特征和经济学作为伦理学的分支之间存在着矛盾”^[10]。经济学的目标包括对财富的追求,但也包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尤其是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使得福利经济学除了效率以外难以容纳其他伦理学目标。

阿马蒂亚·森批判主流福利经济学主要依据以下两点:其一,福利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定;其二,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函数。新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是基于效用而计算得到的,如果将利益描述成效用以外的其他东西,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不再成立。只有功利主义在福利经济学中确立神圣地位,帕累托最优才能是绝对标准。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效用,与其他人的效用也相关。主观能动性重视超越功利主义的、深入人心的价值观和信仰中的东西,那么福利经济学应当关注主观能动性的获取方式:自由。

阿马蒂亚·森认为自由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东西:自由有价值是因为其本身就有利于效率的获取,将“无用”自由移除看似不影响效率,但直接降低了主体可行能力从而降低其福利。移除自由的公平更为可笑,“正常运作的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11],证明了不能保障自由的社会更难以保障生存权、寿命等方面。

(二) 自由福利理论解决了经济伦理问题,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了新工具

哈耶克和阿马蒂亚·森将自由视为效率和公平的工具,构建了新兴福利经济体系,为国民经济兼容公平和效率提供了思路。

1. 国民经济的管理工具是构建协调的市场经济制度

罗斯巴德认为,“经济学家在自由社会的角色是纯粹教育性的”^[12]。经济学家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充当企业家和政治家的约束人。经济学家的主要职能是对毫无意义和有危害的伦理方案进行批判;对各种政策干预后果进行分析,为协调的市场经济制度提供学术性倡导。柯兹纳强调市场并非简单的交易场所,而是协调的工具。只有真正理解市场过程的意义,才能通过秩序性政策和过程性政策“协调”社会福利。

2. “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权力框架是解决福利的工具

兼容效率和公平的社会只有通过拓展人的可行

能力集来实现。“可行能力是此人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11]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主要原因是其遭遇的长期的能力上的不平等,而局限于收入、效用和基本物品的扶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因为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不平等的来源。如果扶贫只能“输血”而不能“造血”,短期的扶贫将随着可能能力的受限而重新陷入贫困。因此,阿马蒂亚·森的国民经济管理具有典型的权利构建和工具自由主义特征。

四、福利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交叉学科与走向统一的时代

拉美与南亚国家实现了自由,但并没有实现效率和公平,足见自由福利理论存在问题。这是因为稀缺不仅仅是资源、权利的稀缺,政治和法律的约束同等重要,由此福利经济学走向了交叉学科时代。

(一) 跨学科福利观:对主流福利经济学的批判与拓展

1. 政治与经济的联合福利观:赫希曼对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综合

赫希曼从事理性与诸多学科不能兼容(理性自负)的研究,并不否认经济理论本身的重要性,只是告诉经济学家不能只沉迷于理论构建,应基于事实、观察的准确理解而非统计上的意义。赫希曼批判斯密的“不受限制的追求私利”的论点,认为这一论点并未区分利益和欲望。对政治家而言,获取正当的利益是合理的,但有权势人员不受控制的欲望可能造成大范围伤害,用“利益制衡欲望”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赫希曼的福利观与主流福利经济学有显著的不同,赫希曼发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认为退出是经济学概念,而呼吁是政治学概念,“退出与呼吁”像“跷跷板的两端”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当社会没有呼吁机制时或者呼吁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时,人才的外流、产品质量的低下使得企业、组织和国家走向衰退;当社会没有退出机制或者退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时,政治运动同样对企业、组织和国家产生破坏性作用。

赫希曼力图通过政治权利设置和个体行为进行有机结合,给出效率和公平的一般研究范式。赫希曼提出了有诸多创意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尤其是经济学与政治学联合分析框架,对社会福利具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联合解读能力。

2. 自由伦理下的福利观:新奥地利学派的福利观发展

受罗斯巴德影响,诺齐克反对罗尔斯正义观,认为“最大限度地使先天条件最差的那部分人受益”是不可思议且损害社会正义的。诺齐克认为,“只有先占才能符合社会正义(持有的获取原则);通过交易获得的是符合正义原则的(持有的转让原则);只有通过正常的竞争性的自由原则而获得或者交易的才是符合正义的(矫正原则)。”^[13]

诺齐克的资格理论表明了分配是历史原则和自由市场原则,而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福利经济学理论是看哪一种分配具有更大的功利总额,功利主义者所持有的就是即时原则特征而非历史原则^[13],使得主流经济学仅考虑什么样的分配是合理的,而没有考虑这种分配是如何发生的。主流经济学的“目的—结果原则”^[15]¹⁸⁴缺乏对自由和权利的尊重,且不能尊重历史也必将导致效率的损失。

(二) 跨学科福利观:对主流福利经济学的坚持与发展

1. 新不可能性定理

AIT具有深远的影响,肯普、黄有光和帕克斯在重新审视反对者和赞同者的条件之后,发现即便在采用少数服从多数(非一致性同意)的条件下,AIT仍然成立。即在给定的适度多样性的偏好下,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排序能够满足强帕累托准则、匿名性加唯序数论原则^[5]。

2. 投票实践的福利观

塔洛克认为,AIT即便正确,在实践中并不重要。虽然没有任何的决策程序能够满足AIT,但一般的决策程序能够在实践中非常接近于满足民主的条件。究其原因,社会问题的空间维度大大少于人的数量且偏好分布非常均匀,诚实可信的多数人投票原则是具有传递性的,AIT就失去了实践中的价值,这一点也得到阿罗本人的承认。

3. 黄有光的“准帕累托准则”

黄有光认为卡尔多准则在效用人际可比的条件下成立,而帕累托准则是在效用人际不可比的条件下成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黄有光对二者进行综合,给出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分析方法——准帕累托改进^[5]。黄有光认为,效用是否在人际间可比,可以通过收入分组加以解决,具有典型的基数效用特征。对于相同收入等级的人而言,由于边际效用基本相等,因此可以进行卡尔多改进。对于不同收入等级的人而言,由于效用人际不可比,只能进行帕累托改进。黄有光的综合具有重要价值:能够在收入分配较大时通过分组而使用帕累托准则,在

组内使用卡尔多准则;能够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小的条件下使用卡尔多准则。分组是决定福利判断标准使用的关键,利用基数效用解决社会福利函数的一次尝试。

4. 消费主义福利观

迪顿对消费行为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最终将福利指标建立在消费上,构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迪顿认为 B-S 社会福利函数是个人主义和基于个人偏好的,“但定义在序数基础上的社会福利函数不是很有用”^[14]。仅在个人消费向量上定义个人的效用函数,将损失许多有趣且重要的变量;如果将效用定义在偏好的基础上,所有家庭有一样的效用函数。人们在进行人际比较时关心的不是人际之间的效用比较,而是客观环境的比较即每个个体面临的约束。

迪顿的福利研究主要围绕“收入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将健康、年龄、收入分配等问题纳入社会福利,是将公平和效率有机结合的典范。迪顿的福利研究具有基数效用特征“研究的目的是放弃序数不可比的要求,通过细致的研究人际比较如何进行,以及什么样的单位使得有意义的福利度量能够加总。”^[14]迪顿认为使用功利主义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不均衡,从而引起较小的社会福利“罗尔斯主义给予社会中最不偏爱的成员以更多的权重,将损害社会整体效率”^[14]。迪顿赞成社会福利函数在不公平和社会加总消费的度量中是有用的,因此社会福利函数在研究个人和社会道德中是重要的,寻找“等价尺度”并对其进行人际比较是意义且可能的。

(三) 走向统一的福利经济学时代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法学、生物学、心理学以及脑科学的研究逐步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假设提出了挑战。学科的竞争和融合形成了不同范式的福利经济理论。

1. 行为福利经济学

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福利也关心其他人的福利,这一点在许多理论中都能得到确认。然而主流经济学基于理性人这一简单的假设发展起来,引起了 AIT 等问题。实验性的市场检验(弗农·史密斯,1962,1982)说明了理性人假定下的公平及个人福利存在相关性。在经济学和心理学的领域,许多实验都表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是偏好考虑他人的。社会偏好在理性与互动的过程中,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后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福利分析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如何确定每

个个体的福利;第二,对个体进行加总。伯恩海姆和兰赫尔认为,福利的新古典方法主要依赖于以下四个假定:一致性偏好、偏好域、一生偏好的固定和不犯错误。实际上,特维斯基和卡尼曼发现,人们的选择和决策的偏好具有情景依赖性,并没有形态良好的偏好或甚至根本没有一致性偏好。科恩、森、罗默和萨格登放弃福利基于一致性偏好的假定,而构建起基于机会的福利概念。

居尔和佩森多费尔认为,人们的决策具有显著的时间不一致性和各种形式的事前自我约束。凯莫勒通过实验证明了在没有互惠空间的条件下具有赠予金钱的倾向;菲尔和施密特、博尔顿和奥肯费尔斯通过实验证明了人们对不平等的明显厌恶;琼斯证明了遵守群体规范的愿望。行为经济学认为偏好不仅定义在个人的消费束上,而且应当定义在社会结果和其他个体消费束之上,只有这样的 B-S 社会福利函数才具有社会福利分析价值。

一生偏好固定,这与事实具有相当的距离。假设我们已经对偏好进行了正确的测量,仍涉及到对多个个体的福利加总,而且加总的是不同时点上的多个“自我”,因此度量难度将非常之大。B-S 社会福利函数是良态偏好的个人福利加总成为良态的社会福利函数的结果,并未对不同时点个人偏好的不同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跨期选择分析时,主流福利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的背离非常显著。

理性人假定与事实数据也存在显著距离。主流经济学认为,选择和偏好不会背离,因为偏好可以由显示偏好而得出。显示性偏好作为福利判断标准似乎也站不住脚。例如,对厌食症的人,显示性偏好是不愿意进食,但这并不是个人福利改进的标准。严守显示偏好理论,将导致严重错误的福利判断。

(2) 神经元经济学视域下的福利。神经元经济学已经积累起足够的证据,证明福利并非总是与功利主义紧密相连。贝里奇认为,决策过程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系统是“喜欢系统”,一个系统是“想要系统”。经济学是建立在满足人们的需要是好事这一假定的基础上的,这一假设取决于“人们喜欢他们所需要的”这个假设。“如果喜欢和想要是一回事,主流福利经济学并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和想要是两回事,标准福利经济学存在问题。”^[15]

从二维神经功能视角重构社会福利函数,早被脑科学家所提出。施耐德和谢弗林最早区别了自动过程和受控过程;史蒂文和斯洛曼使用不同的名字

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基于规则系统和基于联想系统;马修提出反射系统和反思系统;弋尔维茨、藤田和奥廷根提出思辨系统和执行系统,以及卡尼曼和弗里德里希的类型1和类型2都是对受控过程和自动过程的描述。扎荣茨对情感过程和认知过程进行了区分,二维神经元功能如表1所示。

表1 二维神经元功能

	认知(想要)	情感(喜欢)
受控过程(系统2)	I: 当前价值的计算	II: 从情感体验到情感体验
自动过程(系统1)	III: 控制手部的活动	IV: 惊吓后行为

如表1所示,主流经济学很好地描述了I:认知条件下的受控过程,对其他部分行为缺乏有效理解。而福利问题与二维神经元全部相关,因此,神经元经济学视域下的福利,应当综合考察认知和情感、受控过程和自动过程,正如拉切奇尼所说,“情感是第一位的”^[15]。

主流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的最终目标是增进快乐,因此,所有行为的后果都归结为“统一货币:效用”。只有承认基数效用才能真正形成社会福利函数并走出AIT。帕多阿—斯基奥帕和阿萨德的研究结果发现,大脑的眶前额叶包含着基数效用信息,由此神经元经济学构建起“眶前额叶皮层基数效用”。

五、结语:福利经济学将成为国民经济学的方法论

福利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为福利经济理论初步解决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第一,行为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的基数效用回归,为公平、效率和自由的融合提供了非常好的路径;第二,AIT的现实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社会福利函数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第三,跨学科研究成果为社会偏好的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第四,将福利建立在消费、可行能力等客观指标的基础上,大大拓展了福利经济学的应用能力。福利经济学在突破效率范式的基础上,实现多维度、复杂性和跨学科发展,以社会福利构建为目标,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评价,给出社会福利改善方向和路径。如今,福利经济学已成为国民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

(一)公平、效率和自由的平等化以及寻求三者之间的兼容方式是福利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同样影响社会偏好和国民经济管理目标

哈耶克和阿马蒂亚·森等自由主义者的理论在实践中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南亚及拉美国家的失败,说明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与法律自由之间并非不相

关。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从自由主义视角提出了改革的顺序,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勾勒了美好的蓝图。但实际操作中存在系统的结症,改革并非完全自发的也非被设计的结果,以自由为核心的福利经济理论遭到行为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的质疑。米香曾试图以公平为核心构建福利经济学体系,但公平如果失去效率基础,将导致无法衡量效率和自由。因此,只能退回到效率范式。

同等看待公平、效率和自由,并对其关系进行理论构建是合乎福利经济学发展趋势的。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构建起同时容纳效率、公平和自由的逻辑体系,并从中能够发现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找出经济发展的方式、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目标和社会正义的总体变化。跨学科研究是当前经济学发展趋势,福利经济学在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已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解社会偏好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行为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为基数效用提供了基础,构建起更为系统的社会福利函数

行为福利经济学在逻辑起点、核心内容和实践意义方面,实现了从注重科学体系构建到注重道德科学属性的根本性转变(詹姆,布尔多,2013)。阿尔姆和布尔多提出,行为福利经济学从理论和实践上在研究人与人、人与政府、人与自然的“心理契约”,只有从整体上回归到亚当·斯密的道德科学的视角上,福利经济学才能实现研究指标的真正统一。福利经济学的发展,社会福利函数的构建是关键,神经元经济学的发展提出的眶前额叶皮层基数效用,能够为社会福利函数构建提供理论和应用的方法,从而真正达到社会福利中的公平、效率和自由的和谐,实现人类的幸福。

现代福利经济学研究表明,并非完全的自由化、完全的效率化或完全的公平化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幸福源自于三者兼容性的实现。更好地兼顾效率、公平和自由,只能通过对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函数的系统了解。虽然行为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远未解决上述问题,但基数效用的回归,使得福利经济学有希望在效率、公平和自由三个维度上有效兼顾,为国民经济研究提供政策指导。

(三)跨学科研究更好地描述了真实经济世界,为福利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评价和改进提供更为准确的指导

福利问题虽属经济问题,但与政治学、法学、社

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日趋明显。波普尔认知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经济社会分析应依赖于国民经济的情境逻辑。不同的政治、法律、社会道德和心理结构下, 经济社会体现出来的偏好、公平的接受度和发展的迫切度都不同。因此, 跨学科研究更有利于描绘真实经济世界, 为社会福利函数的构建提供素材。

福利经济学分为理论福利经济学和应用福利经济学,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福利经济学的应用关键是构建起符合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偏好的社会福利函数, 只有真正了解社会偏好和国民经济运行, 才能真正地构建起相应的社会福利函数, 从而真正起到改善社会福利和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舍默. 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125.
[2] 麦迪逊. 世界经济千年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2.
[3] 科斯. 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0: 78.
[4] 鲍尔. 预见社会: 经济社会的群体法则[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 195.

- [5] 黄有光. 福利经济学[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6 68 42.
[6]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1: 302.
[7] HAYEK F.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hago Press ,1979: 190.
[8] 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44.
[9] 柯兹纳. 市场过程的意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10.
[10] 阿马蒂亚·森. 伦理学与经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8.
[11]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75 9.
[12] 罗斯巴德. 权利与市场[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264.
[13] 诺奇克.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79 ,184.
[14] 迪顿. 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27 228 232.
[15] 拉切奇尼 格林切尔. 神经元经济学: 实证与挑战[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184.

The Origin , Development and Deconstruction of Welfare Economics

MA Xu - dong¹ , SHI Yan²

(1. College of Economics ,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Hohhoot 010070 , China;

2. China Financial Publishing House , Beijing 100071 , China)

Abstract: Welfare economics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airness , efficiency to freedom. In essence , i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Whether building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can meet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depends on such factors as whether it can construct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rdinal utility , fairness , efficiency and freedom. With the ris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neurology economics , welfare economics system tends to be systematic.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welfare economics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oper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 and constantly repai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Welfare Economics.

Key words: welfare economics; national econom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韩克勇)